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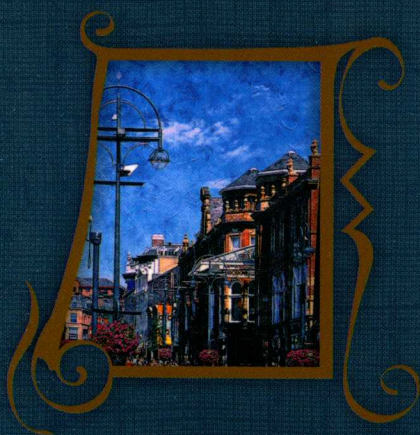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

陈志瑞 刘 丰 主编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Domestic Politics:
Exploration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

陈志瑞 刘 丰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陈志瑞,刘丰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5800-2

I. ①国… II. ①陈… ②刘… III. ①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2532号

- 书 名** 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
著作责任者 陈志瑞 刘 丰 主编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800-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32印张 524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外交政策理论的新发展”（12YJAGJW002）结项成果，并得到外交学院2014年度出版资助。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Domestic Politics:
Exploration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序

秦亚青

—

这部新古典现实主义文集付梓之际,志瑞和刘丰相邀作序,我欣然从命。

我和志瑞认识多年。他是国际关系学界的资深编辑,先后主持多家名刊。五六年前调入外交学院,接手《外交评论》,自此我们成为同事,工作上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其间,他和编辑部同事一道锐意进取、兢兢业业,使《外交评论》的品质和声望得到大幅提升,深得学界好评。志瑞在编辑之余,仍关心国际关系理论动态,本着兴趣和责任先后编撰出版了多部文集,前有英国学派,今有新古典现实主义。

刘丰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界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据我所知,他脚踏实地,用心专一,勤奋刻苦,思敏笔健,成绩斐然。他的成长和进步,是这些年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不只是他,也不只是文集里的几位年轻学者,现在的国关学界,活跃着一大批青年人,他们学养系统、行走中外,熟谙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学术进步日新月异,学术影响与时俱增。

得益于天时地利,如今国际关系研究在我国已成显学,但若求恒久上进,成荦荦大功,则仍需人和,学界同仁的相互合作和共同努力必不可少。这部文集正是志瑞、刘丰及其他年轻学人同气相求、分工协作、精益求精的重要成果。

二

这是一个尝试“对话”的文本。

诚如编者在前言所述,他们当初之所以着手编撰这个新古典现实主义集子,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继续关注 and 引介国际关系前沿理论;积极响应时代的理论呼唤;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国际战略。我很认同这种思路和看法。

稍加回顾,我们当可发现,近三十余年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系统地、成规模地介绍和评述国外国际关系理论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重要一员,我们了解、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是时势使然。在此过程中,我们的身份认同也在相应发生正向、积极的变化,从学习者到逐渐获得了参与、对话乃至塑造的能力。这是一个汇聚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同仁理想追求和艰苦努力的进程,它的参照系既来自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也来自我们身处其中且须臾不分的世界和国际社会。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也仍将如此。

诚然,理论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有其内在规律。近年来,“宏理论”探讨趋于沉寂,现实政策广受热议。在学术发展过程中,这是正常现象,不应妨碍我们继续追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发展。当下的国际学界呈现出三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一是从“宏理论”创造转向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构建;二是从范式间的大论战转向范式内的修正与完善;三是从西方理论的绝对主导转向非西方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参与这几方面的知识转向过程,有意识地发掘潜在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和现实经验,完善既有理论,乃至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而这些努力如要取得成效,获得国际承认,产生学术影响,则需要理论学习的胸襟和气度,理论研究的沉稳和定力,理论探讨的辛劳和汗水,理论创新的勇气和信心。

文集把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在国内当属首例,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开拓性意义。而且,文集在编排上有意打破中外或是撰译的区隔,以“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为上下编把中外学者的相关作品并置在一起。这种形态就像我们面谈切磋、开会讨论一样,意味着构建同一场域的开放时空,使中外学者展开对话和交流。只有在这种平等自由的交流之中,我们才能不断获得对话的能力和自信,参与建构和塑造理论的多元进程。

三

翻阅文集,我们会注意到,国内学者的文章多集中在文集上编“理论探讨”部分。他们或对新古典现实主义做出概要的梳理和评介,或将其与其他现实主义流派进行比较分析,或者质疑这一流派的基本理论路径,试图别开生面,实现某种嫁接和超越。不管怎样,这些研究总体上仍是基本的、初步的,大体止于总结、理解、消纳,即便质疑和批评也是演绎的思辨和推证,尚未系统地利用历史和现实经验来加以检视和证明。所以,文集把更大的篇幅留给“经验研究”部分,我以为是很可取的。

从根本上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接受实践的检验、修正和完善。理论的演绎和批评不易,运用理论展开扎实深入的案例研究和分析可能更加富有挑战性。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这方面的挑战尤显突出和严峻,因为这一理论流派的工具和方法需要调动研究者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能力,国际关系学养和语言功底自然重要,历史学、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积淀同样不可或缺。那些国外代表性学者的案例研究,其结论或可商榷,其观点或可批评,但他们表现出来的研究功力堪称这一理论视域下经验研究的经典成果。

新古典现实主义应和了我们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某些重大主题,比如大国的战略竞争与合作,国内政治对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深刻作用和影响,鉴于这些理论特质,这一流派也往往被认为可以比较有效地用于分析和解释中国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当今中国面临许多重大外交问题和战略挑战,而如何应对、化解乃至超越这些问题和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切实运用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客观冷静、审慎明智、扎实深入的经验和问题研究,为世界和平、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尽绵薄之力,同时也以中国外交的历史和实践不断检验、补正和丰富国际关系理论本身。

任重而道远。借此感言,与文集编者、著译者以及学界同行共勉。

2015年6月
于京西厂洼

目 录

前言 建构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1
----------------	---

上编 理论探讨

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 /陈志瑞 刘 丰	13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外交政策理论 /吉登·罗斯	34
现实主义与国内政治述评 /法利德·扎卡利亚	60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李 巍	81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资源汲取型国家 /杰弗里·托利弗	103
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 /刘 丰 左希迎	134
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 /于铁军	148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之比较 /宋 伟	160
质疑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董青岭	189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空间 /诺林·里普斯曼 杰弗里·托利弗 斯蒂文·洛贝尔	200

下编 经验研究

对权力的认知:一战前均势格局下的俄国 /威廉·沃尔福思	219
认知与欧洲的联盟(1865—1940) /柯庆生	249
三极格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兰德尔·施韦勒	283

捆绑与推诿:预测多极体系下的联盟模式

/柯庆生 杰克·斯奈德

325

没有应答的威胁:制衡不足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

/兰德尔·施韦勒

356

微妙的平衡:冷战时期的权力与认知 /威廉·沃尔福思

393

权力政治与风险平衡:解释大国在边缘地区的干涉行为

/杰弗里·托利弗

421

动态制衡:中国对美国的制衡战略(1949—2005) /贺 凯

454

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 /左希迎

481

后记

503

前言

建构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此书是一本有关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文集。

当初,编撰者着手此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国关学界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前沿的追踪应该继续跟进深入。近年来,国内对“宏理论”的引介和研讨已趋沉寂,由于担心落入所谓三大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研究的俗套,以及对现实政策议题的关注,一时甚至出现了有意无意回避理论的现象,何况抱定理论探究的雄心也殊为不易,但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仍在延伸,其家族仍在壮大,特别是在构建中层理论以及进行跨学科理论综合方面,欧美学界仍显活跃,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其二,当代国际体系演进和对外政策实践正发出新的理论召唤。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理论发展固然有其本身自在的动因和规律,但究其根本,更在于时代生活和实践的促动和要求。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复兴,国际体系正处于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大国的战略调整和对外行为对国际关系进程的影响尤为突出,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也更为复杂、丰富又难以把握,亟须结合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解释和总结,反哺和指导对外政策行为。

其三,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实践和经验的需要。在当下的中国,这种对于外交政策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它既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对外政策实践,也同样关系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塑造和建设。

然而,在此为什么我们要聚焦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呢?

二

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中,先后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体系层次的宏理论,然而外交政策领域的理论化程度却比较滞后,建构总体理论的努力更是进展有限。正是迫于这种理论建构和综合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交政策分析领域,“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分支应时而生。

显然,新古典现实主义方兴未艾,其理论主张和方法尚未定型。大体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主张,理解国家的对外决策和行为,应将体系诱因与国内政治相结合,打通和连接体系、国家和个人等不同的分析层次,构建贴近真实且更具解释力的跨层次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在解释国家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的要素结合起来,构建跨层次的分析模型。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尤为关注大国在面对国际体系的机遇和约束时作出的战略反应和采取的战略行为,也即国际体系的机遇和约束必须经过国内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的认知进行传导,方可形诸战略谋划和调整,转化为具体的外交政策和行为。

可以说,在借鉴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古典现实主义的合理要素,新古典现实主义俨然已成近一二十年间国际关系研究颇具影响的中层理论进展。

其一,当今时代大国竞争呈现新态势,国家行为驱动因素变得日益复杂,而新古典现实主义正契合这一时代背景。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大国力量对比持续调整,各种非体系因素和力量得到释放,诸多非国家力量和社会性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愈益重要。针对大国竞争时代的大国战略行为与战略互动,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单元层次发掘影响国家行为的核心要素,突出了一国政府和领导人在面对体系压力时的能动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理论正是由后冷战时代均势逻辑失灵、主导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关系所催生的。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大趋势下,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形态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家

如何获得安全、谋求发展和维系福利,都面临着很强的约束和艰难的选择,也需要更加精细和动态化的理论来加以阐释、指导决策。

其二,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科多强调超越单一层次的局限,进行跨层次和多层次分析,而新古典现实主义恰好迎合了这一理论趋向。1959年,肯尼思·沃尔兹提出了国际关系分析的“三种意象”,然而围绕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究竟哪种因素是决定国家行为的主导原因,对此国际关系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在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其体系层次的简约性和一般性,使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不由得走向了体系化的理论构建,但这一理论趋向也招致批评,比如体系要素用于解释国家行为时的非确定性问题。而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三个分析层次孰轻孰重,而在于不同分析层次的接合和叠加、彼此之间的关联和逻辑。它强调体系要素与单元要素的共同作用,并以连贯的因果链条将两种要素串联起来,将体系要素作为自变量,单元要素作为中介变量。体系要素塑造和推动国家行为,而单元特征对体系指令的传导会加强或削弱体系效应,使国家行为既可能偏离体系发出的指令,也可能对体系指令作出过度反应。这样,作为一种跨层次理论,它将强调体系要素作用的新现实主义与重视国内政治和个人要素作用的古典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呈现了连通体系、国家和个人层次而进行多层次分析的努力。它尝试走出一条折中的道路。

其三,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彼此隔阂,理论与现实不相融合,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通病,对此新古典现实主义也试图作出回应和弥补。长期以来,即使是在国际关系学科最为发达的美国,理论与政策之间也存在巨大的鸿沟,理论家与政策分析者之间彼此轻视,由此也引出不少有关理论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探讨,推进二者有机结合的呼声渐高。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对大国行为的历史案例分析,尤其注重使用详实的档案材料和丰富的案例内容来展示大国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的内在逻辑,此举既使其研究不乏深厚的历史支撑,同时也获得了很强的政策相关性。

三

毋庸置疑,中国崛起是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新世纪以来,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对国际体系的整体格局和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内政外交也在积极进行调整与改革。

与这一现实进程相伴,国际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中国转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中国现象和议题的讨论都在显著增多。国际关系学科也不例外。

可以看到,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结合和运用中国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的经验,检验、修正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业已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著述既有对历史上中国对外行为的解释,也有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探究。比如,通过比较晚清中国与明治日本面对西方入侵的相似威胁时的不同战略反应及其后果,托利弗发现,两国的国内动员能力在当时的背景下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影响到各自进行政策调整的时机和成效。柯庆生则提出了一种“双层次”国内动员模型,用以解释冷战高潮时期的中美敌对,尤其是领导人如何利用低水平冲突动员大众以支持国家的长期安全战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在分析中国的对外关系时,也应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贺凯考察了建国以来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利用体系结构与威胁认知两个变量系统解释了中国在不同时期针对美国采取制衡战略的类型和强度变化,构建了一个具有经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贺凯与冯惠云的合著中,他们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前景理论相结合,对该理论的分析框架做了拓展,系统解释了中国在面对安全危机时的行为和反应。

除了以中国为行为主体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将中国作为政策应对的对象,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探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比如,郭清水将中国崛起这一外部因素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合法化这一内部因素相结合,试图解释马来西亚为何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对冲这一折中战略,而不是采取追随或制衡等传统策略。在最近出版的专著中,赖友铭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用以分析民族主义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他发现当日本相对实力占优,特别是得到美国支持时,民族主义会致其对华趋于强硬,在靖国神社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尤其明显。施韦勒则从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内政治要素的结合入手,分析为何周边国家不太可能结盟来对抗崛起的中国。

对于理解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路径具有独特的启示和价值。这一理论认为,一国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那么,正如扎卡里亚对美国崛起的阐述,崛起大国将国内财富的积累转化为国际影响力,这一过程既非自然而然,也非一蹴而就;面对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安排的有力约束,

政府和政治精英必须强化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大国角色。从更广泛的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组织的革新以及政治制度的优化,由此增强一国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凝聚国内共识,推进外部目标,在大国竞争中谋得先机,争取有利地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是对外战略实施的基础。新古典现实主义将有关内政外交之关系的传统智慧理论化,对于理解当今时代的大国崛起进程尤为重要。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主张,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反应及其国内根源。从结构视角来看,中国崛起给国际体系既有格局造成的压力也会导致反弹,其带来的安全冲击可能让一些国家防范和疏远中国。因此,中国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疑虑和担忧也在意料之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无法缓解,而防范周边国家疑虑上升,规避不必要的危机和冲突,这些都需要历史的智慧和理论的洞见。比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在面对体系力量对比变化时的战略反应不完全由体系层次的压力所决定,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如何传导这种压力。周边国家的领导人、政治精英和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差异,在对华战略反应上会出现显著差异,那么受国内政治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制约,其外交政策就不会一味防范和围堵中国,而有可能缓和对中国的防范和过度反应。对中国而言,在谋划周边战略时,也需充分考量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对其对华政策以及双边关系的影响,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夯实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国内政治基础。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外交实践的结合,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研究,为理论创新寻找突破点,并进而校准外交政策理论的中国视角。在最近一二十年间,借鉴国外既有的理论范式和路径,探究理论概念和形态的中国化,乃至创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已成为国内国际学界的一个心结和目标。一些学者更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从中寻求可以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构建基于中国视角的理论体系。中国视角的理论化具体表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利用中国的概念来重构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强调中国思想和行为的独特性;二是将中国的思想和经验与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结合,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比较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可能更为契合对中国历史经验与对外政策实践的研究和解释,同时,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和现实也必将成为丰富、完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资源,有利于拓展理论分析的视野,提高理论分析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四

作为现实主义新兴的理论分支,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缺失核心概念,对国家行为未能作出严密、科学的分类,致使其内部缺乏凝聚力,更多地呈现为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路径,而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或研究纲领。除此之外,新古典现实主义或许还面临以下两个更为一般性的理论化问题。

其一,研究取向和偏好的局限。可以说,在充满风险和困境的国际环境中,一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如何更加及时有效地应对威胁,已然成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关注的焦点。这种应对威胁的偏好,使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问题,而忽视了国家大战略中的其他维度,以及适应和创造机遇在一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实施中的同等重要性。

从分析范围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将研究视野局限于国家所面对的威胁信息确定的情形,设法解释新现实主义所无法解释的经验现象,比如国家在面对明显的外部威胁时反应迟缓、应对不力,没有采取有效制衡的行为。里普斯曼等学者就曾试图划定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根据国家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在威胁信息和政策应对信息两个维度上的明晰程度,他们区分了四种理想类型:(1) 威胁信息和政策应对信息都明确的世界;(2) 威胁信息明确而政策应对信息不明确的世界;(3) 威胁信息和政策应对信息都不明确的世界;(4) 威胁信息不明确而政策应对信息明确的世界。他们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适用于第一、二类情形。这一分类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将理论适用范围局限在威胁明确的情形,反映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竞争偏好”,即强调竞争而非合作;另一方面,这是对国家及其决策者所面对情形的“后见之明”,是研究者对历史的概括和整理,并不能代表决策者眼中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决策者面对威胁信息明确的情形少之又少,多数时候并不十分清楚,而在这般情形下如何识别威胁的性质、来源和强度,国内政治要素同样发挥着重要的过滤和传导作用。

与此同时,在大国竞争中,威胁与机遇并存,随着内外因素的改变而

彼此转换。应对风险和威胁的能力固然重要,但一国政府和领导人如果在面临机会时不能适时作出反应,也会坐失良机。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国家面对非常有利的环境,正确的决策能够让它们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而在相似的有利环境下,错误的决策则会让国家脆弱、衰败乃至一蹶不振。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意识到,外在环境和局势的变动,既会给大国提供机遇,也会带来挑战。但无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中,机会所占的比重都显得不多。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困境和挑战是常态,对于隐约显现、稍纵即逝的机会,领导人和决策者如何把握、为我所用?而在处境困难时,领导人又如何做出政策调整,扭转不利的态势和地位?大国竞争,机会殊为难得或不可复得,领导人的决断力、政治精英的内部共识以及政治组织的效能,都会制约机会的把握与利用。

其二,对大国战略行为的分析和解释,缺乏政治价值和伦理的维度。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某种回归基本是技术性的,只是将古典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内政治和领导人等要素找回来,而缺乏深层理念上的回归。

在诸多国际关系理论中,政治现实主义常遭诟病,人们认为这一思想学派强调权力政治,而缺乏对国际政治中的观念和道德因素的深刻关怀。其实,自修昔底德以降,大多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强调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同时,也高度关注一些重要的政治价值和道德原则,尤其强调审慎、克制和适度等政治美德。而由于未能充分重视这些价值和伦理要素,新古典现实主义没有讨论一些驱动国家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权力是国家追求的目标还是手段,国家对外目标与对内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与整体的国家利益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缺失,新古典现实主义使用的一些概念仍存在逻辑问题,如将国家区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或者区分为防御性国家和进攻性国家,进而出现了主张国家以追求权力为首要目标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主张国家以安全为核心价值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分野。其实,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进攻抑或防御,都是国家及其决策者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政策和行为,而不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同时,国家对安全、福利、地位等具体目标的追求,也会受到国际体系的属性、其他行为体的战略以及自身内在条件的制约,既不会一味谋求某种利益,也不会没有节制地追求其最大化。上述概念化分歧及其所暗含的假设,对于理解政治家的现实考量并无太大意义。

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显然不同于以往以地理扩张和领土征服为核心目标、以使用武力为主要手段的旧形态。在 21 世纪的大国竞争中,精确的计算固然重要,政治家的美德和价值关怀更不可或缺。对于负责任的政治家而言,始终需要明确怎样的国家利益是明智的、合理的,怎样的利益诉求会危及国家的安全,怎样的外交政策会损害民众的福祉,从而引导民众走向理性与明智,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此意义上,当我们思考和审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诉求,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时,除了现实层面的战略规划与策略选择,也需要寻求某种思想和理念上的支撑和自信。

五

回顾历史,比较理论,观照现实,总体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特质何在?

其一,它具有强烈的历史与现实导向。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国家回应特定外部环境约束时进行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其研究者共享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即以体系压力为自变量、以国内政治为中介变量。在分析特定国家在某一时期的特定行为时,多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用丰富的经验事实来充实、扩展和检视这一分析框架的概念和逻辑,避免以固有理论的条条框框来裁剪现实。

其二,它重在解释而非指导,呈现而非表现,反思而非臧否。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试图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告诉我们决策者在面对外部机遇与挑战时应该作何反应,采取怎样的政策方为正确有效。相反,它更看重提供对外交决策与国家行为的认知与理解,利用历史和现实经验来展示某种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为人们看待今天的国家战略和对外行为提供观照和启示。

这就不难发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流行和拓展,乃至呈一时之盛,的确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和国际体系有着显著而又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个时代处于某种过渡形态的演变之中,这个世界更加多样、复杂,更具挑战和风险,这个国际体系也显示出令人矛盾和困惑的“系统复杂性”,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与竞争犹如分币的两面,须臾不分。理论的解释和把握需要更加整全、更加精细、更加宏远,因而也更加困难而令人踌